

朱子学文库



3

百年东亚朱子学

BAI NIAN DONG YA
ZHU ZI XUE

朱人求 乐爱国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百年东亚朱子学

BAI NIAN DONG YA
ZHU ZI XUE

朱人求 乐爱国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东亚朱子学/朱人求,乐爱国主编.—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5

(朱子学文库)

ISBN 978-7-100-11837-8

I.①百… II.①朱…②乐… III.①朱熹(1130~1200)—
哲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①B244.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07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百年东亚朱子学

朱人求 乐爱国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837-8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28½

定价:72.00 元



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资助项目

江西省 2011 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

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阶段性成果

《朱子学文库》编委会

顾 问 陈 来

编委会主任 朱崇实

编委会副主任 陈支平 陈武元

编 委

朱崇实 朱汉民 朱杰人 周桂钿 陈支平 陈武元 吴 震

李甦平 蔡方鹿 何 俊 田 浩(美) 吾妻重二(日)

井上厚史(日) 何乃川 高令印 刘泽亮 乐爱国 杨立华

姜真硕(韩) 苏费翔(德) 杨柱才 徐公喜 方旭东

傅小凡 杨祖汉 杜保瑞 曾春海 吴光辉 谢晓东 朱人求

主 编 朱人求

副主编 刘泽亮 乐爱国

朱子学的精神与未来

——《朱子学文库》序

陈 来

在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如果说孔子是上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那么，宋代的朱子就可以说是近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朱子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学者，后人称其学术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在南宋以后，朱子和他的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社会文化影响甚大。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朱子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七百多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哲学。不仅如此，《朱子小学》《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家礼》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礼仪也日益成为东亚民众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朱子学因之成为近世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学仍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朱子家礼》在韩国、在中国闽台地区仍然发挥着它的部分功能，韩国和中国每年都会举行朱子祭礼来缅怀朱子的丰功伟绩，朱子学仍然存活在我们身边，仍然是我们重建精神世界的活水源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换言之，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未来精神世界的建构？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意义。

1. 文化传承

朱子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

古代文化做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辑与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的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贡献，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延续民族文化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重建社会价值的意义。应当学习朱子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抱负和努力。

2. 主敬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讲，敬畏感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从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

3. 学习精神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强调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最大的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属于“大学”，所以朱子学几乎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

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4. 教育理念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的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这些思想都是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5. 实践哲学

朱子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更为强调实践，这种对实践的强调，特别体现在朱子一贯提倡的“知行相须”“力行为重”上。照朱子的讲法，致知与力行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但论先后，知在先，行在后。论轻重，力行为重。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一定能付诸实践、表现于实践。这种精神合乎19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当代哲学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关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6. 化民成俗

朱子的儒学思想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所以，其论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天性和职分，在其本职位上尽伦尽职、尽心尽力。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蒙童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以及《家礼》等，

在社会上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对形成文明的社会礼俗，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朱子这方面的贡献，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近百年来，我国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有过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21世纪以来，朱子学研究开拓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如对朱子的易学、朱子的“四书”学、朱子的工夫论、朱子的经学、朱子的经典诠释、朱子的文学、朱子的自然学，以及朱子后学的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朱子礼学的当代社会实践研究等，都出现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种研究的多元化和广泛性在宋明理学其他大思想家的研究中（如陆象山、王阳明）是很少见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对朱子学的研究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的整体，我们今天仅仅是对于朱熹本人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如何发展朱子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的把握和处理朱子学材料的水平，关注较大范围的哲学思考，仍是朱子学研究应当持守的层面。在朱子后学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发展，只是总体上比起阳明后学的研究来还很不够。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的朱子后学的重要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果完成这些工作的话，对于学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建树。我们应当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朱子后学的研究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进一步说，朱子后学，若只限于一传二传乃至三传的意义，上，还不能穷尽“朱子学”的范围；从更广的朱子学的角度看，元明清的朱子学家思想群体都应有规划地一步步地开展其研究，成为体系，使“朱子学”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历史得以呈现，使“朱子学”的研究更加丰满。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

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中国朱子学研究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今后我们要大力提倡和发展第二、第三层次的朱子学研究。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相同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风景。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真空，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

反观近世东亚的朱子学（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也有不少研究，后来因学科目录中原有的“东方哲学”不再存在，使得相关研究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应继续努力加强其研究。近十年来中国台湾学者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对韩国朱子学加强了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湾朱子学界近年普遍出现了对牟宗三先生朱子研究范式的一些反省和讨论，也促进了朱子哲学研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的开展，并将推动整个朱子哲学研究的深化。

最近，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朱子学会积极吸纳全球朱子学专家和学者的最新成果，拟用五年时间出版30册左右的大型《朱子学文库》，这是继20世纪日本发行《朱子学大系》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朱

子学著作的大集辑，文库的作者群来自全球各地，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内容也以东亚朱子学研究和全球百年朱子学研究为主，我认为，这将是 21 世纪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老一辈的邹永贤教授、高令印教授、何乃川教授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邹永贤教授主编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论丛》，在学术界影响颇佳。高令印教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朱子学研究，其著作《福建朱子学》《朱子学通论》等在朱子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作品《退溪学与东方文化》《朱熹事迹考》被翻译成韩文，为韩国朱子研究者所重视。2006 年，厦门大学国学院复办，复办后的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厦门大学国学院研究组织校内外相关科研队伍，在开展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推动朱子学、海峡两岸国学研究与互动交流方面，成绩突出。近五年来，先后举办（包括联合举办）规模较大的国际和海峡两岸朱子学研讨会六次，出版朱子学研究专著、译著十余部。2011 年 9 月，朱子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创办《朱子学年鉴》，组织举办多次大型国际朱子学会议，团结了一大批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引领朱子学研究走向国际化，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2 年和 2013 年，厦门大学分别获得“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两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朱子学文库》，它也标志着厦门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朱子学研究的中心。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们坚信，发展朱子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加强规划，抓紧开展，促进国际交流，利用目前重视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使朱子学的研究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是为序。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方法

——《百年东亚朱子学》序

朱人求

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当然包括朱子及其在东亚的后学的学说，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①东亚朱子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与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学科的发展前景。在此意义上，关注方法论问题对于未来朱子学研究的走向和突破性成果的取得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最近，黎昕、赵妍妍撰文指出，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方法主要有考证学的方法、史学的方法、义理分析的方法、文化思想比较的方法、体认式的方法^②。这些都是东亚朱子学研究中比较常用的方法，除此之外，近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正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脉络性的转换”方法、多重文本分析方法、诠释学的方法、比较哲学的方法、话语分析的方法等较为新颖的研究方法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 “脉络性的转换”方法

黄俊杰在东亚儒学研究中十分重视“脉络性的转换”方法，该方

① 朱人求《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5～9页。

② 黎昕、赵妍妍《当代海外朱子学研究及其方法》，《哲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32～41页。立足于东亚思想世界，本文就该文未尽之处做进一步的评述，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法在他的几篇颇具分量的朱子学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黄俊杰指出，东亚思想家重新解释中国儒家经典以适应本国思想风土的方法，固然不一而足，但较常见的方法则是在中日、中韩政治与思想脉络之间，进行一种也许可称为“脉络性的转换”工作。所谓“脉络性的转换”，是指将原生于中国文化脉络的诸多儒学经典中的概念或价值观，置于日本、韩国文化或思想家之思想体系的脉络之中进行新的解释。这种跨文化的脉络性的转换工作，涉及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华夷秩序）与政治思想（尤其是君臣关系）两个不同层次的脉络，也激发了诸多跨文化的经典诠释问题。^①

日本儒者所进行的“脉络性转换”，常以将经典中的概念“去脉络化”为其前提，然后再对此进行新的诠释。以“中国”一词为例，黄俊杰认为，就其大体言之，中国古代经典所见的“中国”一词，在地理上认为中国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东西南北四方则是边陲；在政治上，中国是王政施行的区域，在王政之外，是顽凶之居所；在文化上，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的区域是未开化之所。^②在日本德川时期，儒生面对经典中的“中国”概念及其思想内涵时，往往感受到华夷之辨所带来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紧张。于是，他们重新诠释“中国”，赋予其崭新的内涵，以疏解其“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之间的紧张与分裂，从而完成中国经典的本土化改造与适应。日本学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这一概念进行意义重构：第一，将政治意义的“中国”转化为文化意义的“中国”。如山鹿素行将“中国”一词用来指称日本，“中国”指文化意义上的“得其中”，故日本政治安定，三纲不移，非易姓革命政局动荡的中华帝国可比。第二，以普遍性理念瓦解“中国”一词的特殊性意涵。浅见綱斋和佐藤一斋就以中国经典中普遍性的“天”的概念，彻底瓦解了中国

① 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页。

② 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台湾大学出版社中心，2011年，第86～87页。

经典中的华夷之辨。^①

在儒家经典中也存有“脉络性转换”的方法论资源，如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便是使“脉络性转换”成为可能的重要途径。黄俊杰认为，在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域中，跨文化语境之中经典诠释的“脉络性转换”，既展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也展现出超时空的“概念化”与在时空之中的“脉络化”两者间的张力。应该说，黄俊杰的“脉络性的转换”方法独辟蹊径，他以多元论为中心，主张从“周边看中国”，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儒学的研究。在东亚朱子学研究中，“脉络性的转换”方法是一个必要的研究方法，它对我们有效地阐发东亚朱子学的价值观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地揭示东亚朱子学的普遍性知识的在地化、本土化的努力及其新的发展；其次，它的深入展开对东亚朱子学的普遍化、概念化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问题是，“脉络性的转换”方法是否适用于东亚儒学中的所有理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东亚儒学（或朱子学）中，许多内容是超“脉络化”的存在，例如儒家工夫论和境界论中的诸多思想资源，并没有承载过多的国别性的价值使命，无须经过“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解构与重构，直接运用即可。其“脉络性的转换”方法主要适用于分析东亚儒学价值观和承载了特定价值观的理念，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我们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其合理的边界。

承接“脉络性的转换”方法的理路，李明辉指出，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在“脉络化”与“去脉络化”的张力当中准确拿捏，以期彰显其研究对象的多个面向。这是李明辉回顾近十五年来韩国儒学研究而归结出的重要结论。这里所说的脉络特指经典文本的脉络。相对于历史脉络与社会脉络，经典有其本身相对的独立脉络，它们是“概念史”的研究对象。进而言之，即使在历史脉络与社会脉络的研究乃至

^① 黄俊杰《东亚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经典与理念：互动、转化与融合》，台湾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8～92页。

概念史的研究当中，一旦涉及比较的视域时，“去脉络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比较”需要“抽象”，而“抽象”便是“去脉络化”。甚至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抽象”的结果，因而也是“去脉络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下可以说，所有的研究方法均同时包含“脉络化”与“去脉络化”两个面向，只是有所偏重而已。^①相比较而言，李明辉的诠释更加圆融，他把“脉络化”与“去脉络化”上升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脉络化”指概念史研究而言，而“去脉络化”则在比较的视野中得以“抽象”，从而离开具体的历史境遇走向思想的一般。李明辉的“去脉络化”具有一般性的意义，而其“脉络化”的理路与黄俊杰一脉相承，仍然不能作为普遍的方法论。

二 多重文本分析法

多重文本分析法是李明辉在东亚朱子学研究中独创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探讨东亚朱子学时，对问题本身的思想意涵之探讨便必然包含对原始儒学、宋明理学和日韩儒学等多重文本的分析。以韩国儒学中的“四端七情”为例，程朱理学于高丽时代后期（约13世纪末）开始传入国内，至朝鲜时代已取得绝对的权威地位。因此，参与“四七之辩”的朝鲜儒者必须面对双重文本的双重权威：他们除了要面对《礼记》《孟子》等早期儒学文本及其所代表的权威（孔孟的权威）之外，还要面对程朱理学的文本及其所代表的权威（程朱的权威）。由这双重文本与权威所形成的思想背景便成为引发理论争辩的根源。在“四端七情”的理解上，李退溪认为，理能活动四端与七情为异质；四端则理发而气随之，七情则气发而理乘之（理气互发）；四端为自内而发，七情为外感而发；四端在七情之外。李栗谷的论点为，理不活动，四端与七情为同质；气发理乘一途（理通气局）；四端与七情俱是外感而

^① 李明辉《韩国儒学研究的方法论——“脉络化”与“去脉络化”》，《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7～21页。

发；七情包四端（四端为七情中之善者）。在李退溪之后，由于他在朝鲜儒学中的权威地位，参与“四端七情之辩”的朝鲜儒者还必须面对其文本及权威，而形成三重文本。因此，在探讨东亚儒学时，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讨必然要求进行多重文本的分析。^①

这种“多重文本分析”一方面包含对于相对文本的厘清与爬梳，另一方面又涉及现代诠释学的若干基本问题（如诠释的层次、诠释的客观性、诠释学的循环、概念史研究等）。简言之，这种方法必须结合文献考据与义理探讨，其挑战性极大。举例而言，“气质之性”的概念系张载根据先秦儒学所提出来（在先秦儒学中并无此概念），而为宋明儒者所通用。但朱子与刘宗周却赋予它不同的意涵。“气质之性”一词中的“之”字有三种不同的用法：在张载、伊川那里，“之”字表示成分或内容，“气质之性”指由气质所构成的性，气质是气的成分或内容，类似的用法如“青铜之器”；在朱子那里，“之”字表示存在之处，“气质之性”意谓气质中的性，性存在于气质之中，类似的用法如“山谷之花”；在戴山那里，“之”字是所有格，“气质之性”意谓气质的性，是主宰气质的理，类似的用法如“一国之主”。李退溪与奇高峰在辩论“四端七情”的问题时，均援引“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但却分别根据张载与朱子所理解的意涵立场，故得到不同的结论。要厘清同一概念的不同意涵，就需要“概念史”的分析，这是“多重文本分析”的一项重要工作。

“多重文本分析”方法在中国朱子学研究中也同样适用，面对元明清朱子后学的文本，我们也可以分析孔孟文本、程朱注本、元明清朱子后学文本，甚至还可以与东亚世界同时代的韩国、日本朱子学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东亚朱子学的个性与共性。日本朱子学研究亦然，只不过，多重文本相互交叠的现象在韩国朱子学中更为突出。我们认为，朱子学是东亚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态。面对东亚朱子学的核心

^① 李明辉《韩国儒学研究经典诠释》，参见2012年7月9日至11日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第三届青年学者“东亚儒学”研习营课程资料》，第117页。

话语和文本，我们的研究都应该进入东亚朱子学研究视野，对中日韩三国文本进行互校互参，相互阐释。正是在此意义上，陈来先生指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一致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特色的。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从而，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①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多重文本之间的相互诠释与对话，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风景。

三 诠释学的方法

运用西方诠释学的方法解读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命题是近期东亚朱子学研究的热点。在中国经学史上，朱子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和理解的最终归宿。而对“理”的理解，又为“理”的本体论性质所规定，“理”既是天道流行又在“心”中流行。在朱子看来，诠释的目的有三个层次：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朱子诠释经典的基本方法，与之相应的就是句法与心法的诠释。句法的解释是对本文语言的解释。心法是立足于体验的理解方法，但它不同于

^① 陈来《东亚儒学九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4页。